

《爨宝子碑》的豆腐奇缘

《爨(cu àn)宝子碑》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和汉文字演变发展史上占有及其独特的重要地位,是珍稀难得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历史文化艺术和汉文化相融合的结晶物。“爨碑”书体艺术在现今的文化艺术生活中用于书籍封面题签,如《爨史》《南诏野史会证》等,古朴可爱。用于电影片头字幕也很好看,如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投名状》《我和我的父辈》《我和我的家乡》《林则徐》的片头,《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字幕等都别有风味。爨体书法艺术在广州应用得最为广泛。现在比较常见的爨体字为“招商银行”四字。可谁又知道《爨宝子碑》还有一段“豆腐奇缘”呢。



爨宝子碑和碑亭内景。

□孙晓明 孙辰龙

书法瑰宝

《爨宝子碑》全称《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此碑刻于东晋太亨四年，即义熙元年(公元405年)。清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出土于云南曲靖南70里扬旗田，后移至武侯祠，现存曲靖市第一中学“爨碑亭”内，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碑高190厘米，宽71厘米。与《爨龙颜碑》相比较，《爨宝子碑》不仅形制要小一些，字数也少一些。因此，学术界和书法界把《爨宝子碑》称为“小爨”，把《爨龙颜碑》称为“大爨”。

《爨宝子碑》共13行，每行30字。下部为立碑人名13行，每行4字。碑文记录了墓主人爨宝子的生平及对墓主的赞美之辞。碑右下角刻有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曲靖知府邓尔恒的隶书跋文6行。该碑字体属于隶书向楷书过渡的书体。全碑400余字，布局自然、左右顾盼、首尾呼应、气贯全篇、和谐统一、文采飞扬。它的字体奇异、独特，与中原王朝保持紧密的文化关联，又自成一家，以特殊的笔法，结字，风格，气势，傲立中国书法历史。

《爨宝子碑》清晰记录了碑主爨宝子的生平。爨宝子，建宁同乐人(今云南陆良人)。生于公元380年，卒于公元403年。时年19岁即就任建宁(今云南曲靖)太守，身处中原战事仍频，而爨氏统治南中(今云南、贵州和四川南部)的强盛时期。南中最有势力的大姓为霍、爨、孟三姓，公元399年，霍、孟二姓火并同归于尽后，爨姓成为最强大的势力。爨宝子虽为弱冠，但却极善于审时度势，一方面对中原王朝表示服从，一方面实行民族平等、团结政策，为政勤勉，人民安乐而各得其所。故而在他死后，官民皆悲恸不已，特意为他刻石立碑，寄托哀思与崇敬之情。

豆腐奇缘

《爨宝子碑》是中国书法独有的存在，历经1600多年，命运坎坷多舛，身世扑朔迷离，虽立于公元405年，但因朝代更迭，社会动荡，《爨宝子碑》湮灭于红土之下，清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出土于云南曲靖南70里扬旗田，出土一段时间后，该碑也不知去向。

清咸丰年间，邓尔恒担任云南曲靖知府。此人进士出身，历史知识丰富，关心金石碑拓，履职曲靖，自然想起那块赫赫有名的《爨宝子碑》。他遣人多方寻找，都一一落空。在曲靖知府官邸看着《爨宝子碑》文献的邓尔恒，猜想那块名碑的形制与风仪。感慨若有缘见面，也是宦海中的奇遇，人生中的幸运。可是，遥远的西南边陲，飘摇、迷乱的世道，无从寻觅那块谜一样的古碑。对于一位富有文化情结和书法喜好的士大夫而言，这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精神折磨和苦痛。

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邓尔恒从坊间得到消息，市场出售的一些豆腐出现了一些有趣的字，点线干脆，撇捺清晰，可识可读。很快，有字的豆腐摆在了邓知府的面前，豆腐上面的字太熟悉不过了，就是《爨宝子碑》上的字。他显得有点激动，朝思暮想的《爨宝子碑》与自己如此之近。顺藤摸瓜，他在曲靖府城南三十五公里的扬旗田村发现了《爨宝子碑》。

彼时，这块名碑成为乡下豆腐房里的底板，农户榨出来的豆浆在碑面翻腾，与卤水相伴，渐渐冷却、凝固，成为固体的豆腐。那个时代文盲特多，豆腐消费者会关心豆腐的老与嫩，是否可口，不会在意豆腐上面那些奇特的字。这些字，就是《爨宝子碑》的信使，它以特殊的方式告知自己的存在。终于等到了这一天，邓尔恒急匆匆赶来了，作为《爨宝子碑》的知音，他要把这块沉寂日久的碑唤醒。农户家里来了知府，不是小事。是为豆腐底

板而来，当然更觉得好奇。农家主人向邓尔恒讲述了与这块石板的相遇，记不得是哪一天了，他在田间犁地，偶然犁出埋在地里的石板，挖出来，看到了石板上的花纹和整齐的字，觉得好玩，便搬到牛车上，拉到家中。长方形的石板在农家的用处太大了，可以做房屋的地基，可以垒猪圈，可以当作晾晒农作物的平台。或许如此使用这块平整的石板是一种浪费，农家主人就把石碑洗干净，置于豆腐房，成为制作豆腐的工具。酷爱《爨宝子碑》的邓尔恒，在豆腐房里久久伫立，他对农户说了很多感谢话，并提出向农户支付了三十两白银，把石碑运到城里保存。农户主人当然高兴，他与其他一同将石碑搬离豆腐房，小心翼翼地放到车上，运往曲靖府。那一天，邓尔恒一夜无眠，先请人精拓了数十张，作为具有金石研究能力的地方官，邓尔恒以冷静、客观的文辞陈述了《爨宝子碑》的前生今世，他以整饬、端庄的隶书书之，刻于石碑的左下方，又拓了一批。然后，选了一个吉日，将碑石置于城中武侯祠。

历经一千多年岁月风烟的石碑，依然完好，尤其是石碑上的字，字口清新，笔画生动，易于识读、临习。据说，《爨宝子碑》的相对完好，于豆腐有关，制作豆腐的过程，大量豆浆浮在碑面上，豆浆凝固的过程，豆浆也会浸入石碑，起到保护的作用。

1937年，原中华民国教育厅拨款委托原曲靖中学校长谢琅书在校园内建造了“爨碑亭”，将东晋《爨宝子碑》和宋朝《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并置于一亭之中。至此，命运多舛的《爨宝子碑》终于安定下来，受到了全面的保护。

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曲靖市第一中学陈列的两块碑刻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指令有关部门和曲靖市第一中学加大保护力度，扩大保护范围，并建造了庭院式的双亭碑苑，爨碑重获新生。

□赵长征

骑马原来不用鞭？

说完了射箭，再来说说骑马。

在今天的影视剧中，我们常常看到驾车的人用皮鞭猛抽车辆的驾马。而实际上，先秦两汉时代的马车上，用来催马的工具并不是鞭，而是策。

与柔性的皮鞭不同，策是刚性的，是一根小竿子，前端装有一个金属的短刺，可以用于敲击，也可以用于刺。因其长度并不是很长，所以主要只是作用于马的屁股。

你可能会问，用策驱赶驾车的马匹，那鞭子用来干什么呢？答案是，可以作为策的补充，但更主要是用来打人。一方面，可以驱散车旁边的行人；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战争中作为一种辅助的武器，来打击逼近的敌人。

在日常生活中，鞭子是一种常见的惩罚用具。在先秦典籍中，有许多用鞭子打人的记载。只是后来骑兵兴起，骑在马上，用鞭子打马比策更加方便，所以鞭子也就用得越来越多了。

后来，在人们的生活用语中，就渐渐地鞭、策不分了。直到我们今天，还有“鞭策”这个词，常常用来指师长对于后辈的鼓励和督促。

方天画戟？不存在的！

再来说一个，大名鼎鼎的吕布的方天画戟，其实大多数影视剧里的方天画戟都是错的。

《诗经·秦风·无衣》说：“王于兴师，修我矛戟。”“王于兴师，修我矛戟。”那么，戟又是什么呢？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戟就是《三国演义》中吕布使用的那种兵器，所谓“方天画戟”。在明清时代出版的小说绣像中，这种戟被画成了以矛为主体，在矛的一侧，还加上了一个月牙状的弯刀。

后来这种武器形象影响了戏曲、连环画以及今天的影视作品，可谓深入人心。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这种戟，更准确的称呼应该是“戟刀”，是在宋代才出现的，三国的时候并没有这种戟。

先秦时候的戟，是戈和矛的合体。也就是在一根柄上联装一个戈头和矛头，这样就同时具备了这两者的功能，既可以向前刺，也可以向周边上下进行啄击和勾杀。

因为戟综合了戈和矛的杀伤功能，所以非常受欢迎，在战场上就渐渐取代了戈的地位。尤其是到了战国以后，戟成为主流，戈就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湖北随州的曾侯乙墓出土的兵器中，除了正常的戈矛联装戟外，还有的戟在戟体下再加装1-2件戟体，以增强杀伤力，墓中的简文称之为“二果”戟、“三果”戟，也就是二戈戟、三戈戟。看上去，显得十分威武霸气。

(据赵长征《春秋车战》)

这些古代战争场面全都拍错了！

我们以最常见的右手拉弦为例，来说明射箭的动作。将扳指戴在右手的大拇指上，用小缺口或小突起勾住弓弦向后拉。为了加强拇指的力量，还要把食指和中指也压在拇指上。箭杆在弓身的右侧。在瞄准之后，撒开手指，释放弓弦，把箭射出去。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两种不同的射法呢？

因为中国的弓是亚洲复合弓，也就是由多种材料制造而成的弓。复合弓的弓臂主干并不是由一根单一的木竹料制成，而是由多段材料叠合拼接而成，这样弓力更强。

亚洲复合弓的弓体较短，弹性却很好，弦可以拉开很长。而欧洲的弓是单体弓，也就是由单一材料制造而成的弓，最典型的代表是英格兰长弓，弓体长，弹性差。在美国电影《勇敢的心》里面，就再现了英格兰长弓的作战细节。

这两种弓拉满的时候，弓弦形成的角度不一样。亚洲复合弓往往会形成锐角，所以勾弦处不能放太多手指，否则手指会受到挤压，这样，用单个拇指勾弦就成了最佳选择，最终形成了“中国式射法”。而欧洲单体弓的弓弦角度较大，勾弦处比较宽松，所以可以用三个手指勾拉，最终形成“地中海式射法”。